

吴永喆 乔万民 选注

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吴永喆 乔万民 选注

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柳宗元 / 吴永喆, 乔万民选注.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2

(唐宋八大家)

ISBN 978-7-80696-367-8

I. ①柳… II. ①吴… ②乔…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唐代 IV. ①I26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8486号

唐宋八大家·柳宗元

吴永喆, 乔万民/选注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302 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80696-367-8 定价: 20.00元

柳宗元生平及创作简介

柳宗元是唐朝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生长在唐朝中期。天宝十四年(755年)相继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安禄山、史思明大规模叛乱,唐王朝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平息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国家统一时时受到掌握实权的军阀割据势力的威胁。朝廷大权逐步被宦官侵蚀,中央集团统治几乎名存实亡,而官场内部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进步正直的官吏屡遭打击和排挤。柳宗元充满坎坷磨难的一生便是最有力的实证。柳宗元早期曾积极从事反对宦官和贵族大官僚的政治改革,为此他受到豪强权贵的严重迫害,被长期贬谪,但柳宗元却因此深入生活,接近人民,以正直而才华横溢的笔从事文学创作,宣传进步的政治和文学主张,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奢靡的文风。

这一时期,正是文学领域的散文复古运动由启动走向高潮的阶段。许多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六朝以来的奢靡文风日益成为社会的公害,它不利于人们表达政治见解,不利于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因而发出了复兴先秦两汉文学传统的呼声,并积极投入复兴古文运动的进步洪流。柳宗元同韩愈一道,扛起了复兴古文运动的大旗,担起了复兴古文的重任,并为之贡献了巨大力量,从而与韩愈一同成为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们政见虽不完全相同,但在推动古文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使这一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散文这一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原籍河东解县(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柳家因为世代做官,便在首都长安购置了田宅,柳宗元就出生在长安,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已基本平息后的第十年。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先后做过录事参军、长安主簿和殿中侍御史,他为人正直,富有学识,爱交朋友,因屡次向横暴的军阀和陷害贤良的大官僚

提出批评而遭迫害和贬官,但他从未屈服,并以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因此,他周围有不少正直善良而又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不乏名人。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是一位勤恳慈爱而有学问的妇女。家庭的教养对柳宗元后来的品格、性格、学识等有重要的影响。

柳宗元天资聪颖过人,童年时期,父亲仕宦江南,他与母亲留在长安,在母亲的教导下,四岁即能熟读十几篇古代辞赋。少年时期,他随父亲游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无论是山川风光还是历史人文,都已郁于胸中,才情初步展露,以一些颇有水平和见地的文章,在文坛崭露头角。公元786年,一个叛乱的军阀李怀光被朝廷讨平,当时一个姓崔的中丞请柳宗元代写一篇向皇帝祝贺的奏表,这是如今能看到的柳宗元最早的一篇文章,文章虽已残缺,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文笔的老练和反对军阀割据的政治态度。而此时的柳宗元才十三岁。这时的柳宗元已经树立了宏伟志愿:“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期望自己能具备高尚的品德,使古代优良的传统通过他的努力而发扬光大,期望能像古代有作为的人物一样,建功立业,青史垂名。事实上,这成了他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

贞元九年(793年)二月,柳宗元以二十一岁的年龄考取了进士。唐德宗知道柳宗元是柳镇的儿子以后说:“我知道柳镇是不会为他儿子考试去求人情的。”因此,柳宗元的考取进士,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他同科考中的还有他后来的好朋友刘禹锡。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柳镇在长安去世了。韩愈在后来所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写道:“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从“柳氏有子矣”这句话可以看出柳氏家族对柳宗元期望之重,所以柳宗元也就在仕宦途中继续热心求进。

父亲去世后,柳宗元到邠州(今陕西省邠县)去探望在军中任职的叔父。两年时间里,他经常游历边境,同士兵谈心,并从中了解了一些骄兵悍将虐杀人民、掠夺民财、兼并土地等事实,也听到一些英雄人物同凶暴兵将作斗争的感人故事。其中段秀实的形象使他久久不忘,二十年后,他还记忆犹新地写下了《段太尉逸事状》,提供给史官作参考。

贞元十四年(798年),柳宗元在二十六岁时又考取了博学鸿词科。

随后做集贤殿正字，替朝廷编纂校订图书，从此，他便正式进入了官场。此后，柳宗元一度被调任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又回到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的任务是监督检查官吏的工作，里行，相当于见习官。

在这期间，柳宗元已经不是单纯的自己求进了，他的眼界进一步开阔，政治热情也不断上涨，从各方面表现出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自己独立的思想见地。贞元十五年写了《辩侵伐论》，十六年写了《韦道安诗》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柳宗元对时事的思想见地和对于正义不屈的英雄人物的歌颂。而且在《韦安道诗》的结尾，他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当时现实的不满：“烈士不妄死，所死在忠贞，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明确提出了官吏当为民服务的认识：“夫仁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又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批评当时的税法不利于民：“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这些文章都强烈地表现了柳宗元思想富于人民性和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从而，也铺就了他四十七年人生的基本轨迹。

柳宗元的声名渐起，引起了官僚及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注意，许多人想结交这个不可多得的青年，不少重要的政坛人物都想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而柳宗元已不再单纯汲汲于仕进，他有比仕进更为重要的选择，那就是实现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因此，他所结交的人中，多是正直而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人。

当时，他和正在积极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建立了友谊，也经常接待前来请求指导写作的文人，不少人经他指导而大有长进。

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文笔雄健、态度鲜明的作品：在《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勉励到边境去的独孤生。以文章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做出贡献，宣扬国威，鼓舞将士爱国戍边；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特别赞扬了范传真做官不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是时刻为百姓着想的境界；在《天说》中抨击了对自然现象的怪诞迷信的说法；《驳复仇议》探讨了一个法律问题，指出，对一个为父亲复仇而杀人的人，既判死刑又加以旌表，这是荒唐而悖理的行为；《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描写长安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技能，寄寓了作者的政治生活理想。这些作品对于古文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柳宗元对政治、社会、人生等诸多方面处于积极探索阶段,也是他的追求仕进之心与他改造社会政治理想相结合的阶段,他逐渐与后来永贞革新中的中心人物王叔文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叔文出身微贱,曾以善于弈棋而待诏翰林,当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王叔文在东宫侍读十八年之久,而在伴太子读书期间,他经常给太子讲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经常与太子谈当朝统治政策中的种种弊端,谈眼下民间的疾苦,因此,深得太子的信任。永贞革新中的另一位人物韦执谊出身于长安的旧族,在德宗时就是翰林学士。《新唐书·韦执谊传》说:“帝诞日,皇太子献画浮图像,帝使执谊赞之。太子赐以帛,诏执谊到东宫谢,太子卒见无所借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执谊繇是与叔文善。”

参加王叔文集团的除了韦执谊、柳宗元外,还有刘禹锡、王伾、陆淳、吕温、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这些人中大多是出身较低、学有专长而且品质优异的知识分子。他们密切合作,共同规划着怎样革新政治,振兴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准备在李诵继位之后干一番事业。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去世,李诵嗣位当了皇帝,是为唐顺宗。顺宗起用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后又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取得了政治上的权柄,韦执谊经王叔文推荐被提拔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柳宗元的官职是礼部员外郎。其他人也都担任了主要职务,从而组成了以王叔文为核心的颇有实力的人才集团。他们在五六个月内就积极而迅速地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治改革措施,对于这些改革,即使是诋毁王叔文集团为奸党的史书,也不得不如实加以记载。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对“官市”和“五坊小儿”的罢免。所谓“官市”,是说宫中采购东西先由官吏后来就由宦官操持,可以随意压低物价,强买货物。而到后来就更进一步,在市场里设置几百人,号称“白望”,看见人家所卖的商品有可取的,便口称“官市”,一钱不给就拿走。这一点白居易在《卖炭翁》一诗中有生动的描述。至于“五坊小儿”则是官中设有“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鹞坊,三曰鸡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中当差的人。“五坊小儿”扰民之事更多。据《通鉴》记载:“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横暴以取人钱物,至

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值，多被殴骂。”

像这样的腐败现象，最为百姓痛恨，影响也最坏，所以王叔文等一当政，首先就取消了“官市”和“五坊小儿”，自然深得民心。接着，王叔文集团还以极大的魄力罢免了为民痛恨的酷吏——京兆尹李实，将他贬为通州长史。李实在京城大旱之年不仅不体恤民情，反而聚敛钱财以拉拢朝中要人，当德宗问他外面百姓生活状况时，李实明知百姓穷苦无状，却谎称：“天虽大旱，秋后照样有好收成。”以致百姓将田里的青苗都卖掉，以奉朝廷挥霍。李实被贬时，京城百姓曾经怀揣瓦块石头以拦路打击他。除此之外，王叔文等还先后放出宫女以及教坊女乐人等九百多名。还曾诏令以前被贬降的一批有才能的官吏回京复职，其中包括陆贽、郑庆余、韩皋、阳城等人。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之后，王叔文等人就开始了一个更重要的革新计划：革除唐朝历代最大的赘疣——宦官和藩镇的兵权。他们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正是在这个重要环节的落实过程中，宦官藩镇以及一些贵族官僚坐不住了。出于自身利益，他们纷纷起来，并沆瀣一气，对王叔文集团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攻。先是剑南四川节度使韦皋令使者对王叔文要挟说：“如果将剑南所有地盘都归我管，以后我将报你的恩；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就与你为仇。”王叔文没答应，韦皋就上表，请求让皇太子监国，又给太子写信，在信中公开指名攻击王叔文等人。继韦皋放了头炮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纷纷仿效，起而攻击。而诸多因素中最不利的一个方面就是，信任王叔文等人的李诵刚刚继位便身患重病。于是宦官俱文珍等人见形势有变，时机已到，便与军阀豪强等相策应，请太子李纯监国，顺宗便于这年八月让位给太子李纯，也就是唐宪宗。宪宗本是宦官所拥立，即位后立刻体现了宦官们的利益，满足了宦官和军阀豪强的要求，将王叔文集团的成员一一贬斥放逐。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朝廷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一个月之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他刚走到半途，又接命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同时被贬为边远州司马的还有：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韦执谊为

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準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至此,一度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宣告结束。

这一年,柳宗元三十三岁。

永州地处湖南和两广的交界处,治所设在零陵,是一个荒僻的所在,而永州司马对于贬谪而来的柳宗元来说,实际上等于无任何实权的罪犯。这年冬天,他携带六十七岁的老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永州,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寺庙里。

公元806年,宪宗继位后改年号为元和,在宣布大赦之后又特别降诏: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一年,柳宗元的母亲因水土不服而病故,王叔文被朝廷赐死,凌準因害眼疾去世。柳宗元感到孤愤难遣,情绪低落,一些人把柳宗元描绘为“怪民”,昔日的故旧友好当中,有不少人怕受连累而不再与他有任何往来。在永州的头五年中,他的住所被火灾四次延及,有一次他仓皇逃出才保全了性命。

永州远离皇都,但柳宗元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百姓,从而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一边大量地阅读古今典籍,一边思索自己以往的政治经历,同时将思索所得形成文章,于是产生了《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山水游记。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是利国利民的,是“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因而对自己的政治思想“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饷药九寿书》)。在《吊屈原文》中,柳宗元强烈地指责了社会的黑白颠倒,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表示无限钦佩和向往。他激愤地说:我真为如今的当权者感到悲哀,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时事的兴衰。他们拿国家俸禄唯恐不多,为自己官位不高而烦恼。我被贬黜蛮荒,不得不忍耐寂寞,而政治主张从而难以实施。既然眼下苟且偷安的风气不能祛除,我也就更加怀念你呀,屈原先生。在《瓶赋》一文中,他将一些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人比做盛酒的皮囊,它虽让嗜酒之人爱不释手,可也会使人醉酒丧志、不辨是非,甚至损害国家利益。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一个瓶子!它从深井中提出纯洁的水,可以用来调解各种滋味,解除人们的饥渴。淡水虽然不甜,但也不会腐败,而且从不曲意逢迎任何人。即使有一天绳子

断了,瓶子摔碎了,这瓦瓶还归于泥土,就如同回到老家一样,恢复本来的面目,无怨无悔。在一般人看来,与酒囊相比,瓦瓶的一生是不明智的,但它不媚俗、不利己,而有利于社会,他的行为之高洁是酒囊之徒难以望其项背的。

柳宗元在《首春逢耕者》一首诗中说到他钦慕隐居生活,但摆脱不掉尘世的干系,从事政治革新却又遭到失败,不如与农夫常聊聊天,以倾诉返璞归真的愿望。由于地位的下降,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劳动人民,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在永州司马的任上,柳宗元深知没有实权,政治思想也难以实现。所以,他在经常去农家田头了解情况、述诸于诗文的同时,充分利用空闲时间钻研典籍,探索哲学、人生、历史、社会等诸多问题,努力著述和创作,积极宣传进步思想。这些著述和创作的内容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对迷信神怪,主张自然是物质的,天是没有意志的;二是反对贵族特权,重视人民的力量和权利;三是反对消极在世,提倡积极关心现实,为社会大众服务。《贞符》一文草拟于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期间,而最后完成则是在永州司马任上。文中贯穿了作者这一观点:大自然的变化是物质现象,与人类命运的吉凶祸福毫无关系,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本身,而不是天,不是鬼神。统治者应当重视人民的权利地位,改善人民生活,以争取人民的拥护,否则统治必不长久。

古代的君主和御用文人为了证明君主的权力“受命于天”,常常捏造附会一些神怪事迹,如当某君主获得统治权时,自然界会显现某种祥瑞事物,这种祥瑞事物被称为“受命之符”,也就是“天授君权”的凭证。既然君主的权力受命于天,也就自然非人力可夺,所以百姓就得俯首帖耳地听凭他们的统治。柳宗元首先在《贞符》中戳穿了符的欺骗性本质,并且指出统治权的获得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人民,吉利的凭证不是来自于所谓瑞祥的事物,而是来自于其统治政策有利于人民。没有一个腐败的政权能持之久远,也没有依靠瑞祥之物而长生不死的人……能够继承祖先优秀品德的人可以继承职位,而道德堕落的人,他的职位就会被剥夺。

《非国语》是柳宗元在永州花了相当长时间完成的又一力作。《国语》是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一部重要史著,艺术性相当高,但其中对好多历史

现象的解释却包含了神权迷信和维护贵族特权的内容,柳宗元认为这些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就像用漂亮的锦缎所覆盖的陷阱,如果不把它指出给人看,读《国语》的人将有好多会掉在里面。柳宗元针对这些荒谬之处,作了六十七篇《非国语》,给予一一批驳。

《非国语》的意义不止局限于对《国语》一书的批判,而是对旧社会中反动落后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非国语》刊布后,许多士大夫将它视为离经叛道的危险言论,进行攻击,曾有不少后来人出于“卫道”的动机,作了《非国语》之类文章,但最终都经不起推敲不得流传,而柳宗元的《非国语》却以其所闪耀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批判现实的精神而于千年之后仍熠熠生辉。《非国语》每篇大都几十字上百字,但其说理精辟透彻,一针见血,写作手法自有独到之处。

《封建论》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所写的一篇探讨历史发展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杰出论文,它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社会制度形成于“势”,而非“圣人”之意,同时猛烈谴责了割据所造成的国家混乱和生灵涂炭,抨击了将国家土地当做私有财产的贵族世袭制,强烈要求国家统一,任用贤人,政治清明,让人民安居乐业。文中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这段话指出,治理天下的规律是:政治清明才能得到人民拥护,要想政治清明,必须择贤者处于领导地位。而“封建者”治下,贵族一代继承一代统治着国家,这样长期下去,在上面的就不一定是贤人,在下面的不一定就都是不肖之人。这样一来,人民遇到的是太平还是祸乱就难以测知了。《封建论》以历史发展和人民利益为立论中心,引证了大量史料,如“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以至“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等等。有力驳斥了形形色色要求恢复贵族分封制的谬说。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可见这篇论文在政治理论和现实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封建社会的伦理学家为维护统治阶段的统治基础,提出了“六逆说”,

《左传·鲁隐公三年》说：“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爱子教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柳宗元就此写了《六逆论》这篇论文，对所谓“六逆”中的荒谬之处予以驳诘，指出，统治者所说等级高贵、关系亲近、资格老的人可能是“愚人”，而地位贱、关系疏远、资历浅的人可能是“圣且贤”；这样的“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则是合理的，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更有利的。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荒谬而靠不住的。在《永州铁炉步志》中，他将这一批判精神由抨击世族豪门势力提高到对君权世袭的否定。认为尽管像禹、汤、文王、武王这样建立巨大功业的人，他们的子孙桀纣、厉王、幽王如果顶冒着祖宗的老招牌胡作非为，其遭到失败是必然的。在《伊尹五就桀赞》中，柳宗元指出：“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伊尹作为一个圣人，他所在乎的是百姓的利益，而并不在乎什么夏王朝与商王朝的名号。他考虑，如果夏桀能听从他的意见，成为为民谋福的帝王，就甘心为他出谋划策，但事实不是这样，伊尹五谏而不得其效，便帮助商汤推翻了夏桀，其最终所考虑的，还是百姓的利益。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柳宗元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而君王豪强之辈以及他们的王位和权势也是大可怀疑和蔑视的。

在永州，柳宗元还经常和朋友们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争辩，他在争辩与讨论中，还是保持着初入仕途那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的谈锋，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的亲戚杨海之考虑到他目前的处境，劝他谨慎为人，不要把自己的想法随便告诉别人，柳宗元在《与杨海之第二书》中说：“我与你多次通信，差不多都是为了阐明‘道’。这‘道’是属于大家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所能独自占有的。因此，自己有不正确的看法就应该自我暴露出来，让人们公开批评讨论，最后采取他们意见当中的正确部分，用以纠正自己的看法，这样，‘道’才会得以为更多的人所见所有，并发扬光大。而掩盖自己的观点，则是放任自己而不求进步的做法。”柳宗元正是以这种态度，与友人不断讨论、争辩，从而不断地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柳宗元和韩愈之间曾就人与天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次严肃的讨论。元和八年(813年)，韩愈经人推荐就任史馆修撰，柳宗元闻知后，即给韩

愈撰写了一篇史传文章《段太尉逸事状》，希望韩愈在任史官这一重要角色当中，能秉笔直书，贬恶扬善，但韩愈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表示要辞去这一职位，他还在给一名叫刘轲的秀才的信中说，不论孔子、左丘明、司马迁，还是班固、范曄，自古至今的史家，没有一个得以显贵并保全后代昌盛的，却往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柳宗元知道以后感到十分气愤，第二年正月，柳宗元专门写了一封长信，与韩愈争辩史官的“天刑”与“人祸”等问题，信中说：“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韩愈字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由于柳宗元和韩愈友情深，平时期望殷切，因而信中对他的唯心观念和消极态度的批判也是少留情面而言词激切。

柳宗元离开长安，更多地了解了民间疾苦，也更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地之官对百姓和社稷应负有的使命。他有个叫薛存义的同乡，在永州所属的零陵县任职，他为官勤勉，处事公正。当薛存义卸职到其他地方赴任之际，柳宗元写下了一篇至今读来仍具现实意义的文章给他送行，成为柳文中具有强烈人民性的代表作之一。

在永州时的柳宗元，由于更多地接触百姓，思想更加开阔；由于他遭受政治上、生活上的磨难，性格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永州是一个偏僻而荒蛮的地方，但这里由于南对九嶷山，北依衡山余脉，加之湘江和潇水交汇于此，所以永州境内是个群山环抱，河流交错的画境。作为一个贬官，而又无实权，游览山水，寄寓情感便自然成了柳宗元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在这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鉭潭记》、《钴鉭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山水游记等文章，已不再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般只叙述描写所见景物，也不同于后来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柳宗元将游览所见的在常人看来平平常常的景物，用独特的眼光去看，用注满情感与悲慨的笔去写。所以，他笔下的景物便带有了明显的情感色彩，从而使游记这一文体登峰造极，成为后人难以企及其造化的文学形式。

元和四年（809年）九月的一天，柳宗元坐在永州法华寺西亭上，忽然

发现过去并没有注意到的西山风景的奇异不凡。他带领一拨人沿着冉溪,从无路可走的西山脚下,披荆斩棘,登上绝顶。纵目四望,高低的原野,重叠的山峦,曲折的河流尽收眼底,他感到心胸无比开阔,因此写了《始得西山宴游记》来纪念。文中称西山“不与培塿同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几天之后,西行到了钴鉭潭,柳宗元乐其清,赏其静,悦其形,忽然插入一笔:“其上有居者……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八天以后,柳宗元又从钴鉭潭往西走,看到一座小石丘,作者在文章中所见进行了十分形象的描述之后,就引出小丘为异地,标价四百而无人问津,柳宗元将它买下,然后进行了一番改造,使之生机盎然,之后感叹道:“以兹丘之胜,致之澧、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鉭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所写《永州八记》的第四篇最为有名,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作者将小石潭周围的环境与小石潭本身之美以出神入化的彩笔进行了工笔描绘,令人如临其境,心神向往。而在临结束之时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坐潭上,四百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此后的《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四篇中,当以后者为佳,作者感叹小石城山之美仿佛不是出于自然,而是聪明人的巧思精制。接着又议论道:“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天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在这里,乍看柳宗元似在闲暇无事之际的自娱于山水,其实当中不少篇幅深藏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蕴含着一股磊落不平之气:西山的“不与培

墟同类”，“与灏气俱”，“与造物者游”，分明在写其最初从政的志向与抱负；使他“乐居夷而忘故土”的钴鉭潭则映衬出柳宗元初贬永州时的心态；胜景非常而却处偏僻，虽廉价而不得其售的潭西小丘则明是隐喻了作者自身虽负命世之才而见弃于朝廷的自怜之心与不平之气，又以“我”与“小丘”之“遭”道出了作者的孤苦无诉和知音难求的不合理遭遇；小石潭的“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正是作者自身心境的物化；而《小石城山记》中的一段感慨，则在自叹与自怜的基础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对造物者的有无所提出的质疑，正是对命运的控诉和对当权者的严厉指责。由此来看，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及其他山水游记作品绝不仅仅是志得意满的封建士大夫余闲的散心消遣、自娱娱人之作，而是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形式巧妙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优秀散文作品，它们犹如闪光精美、玲珑剔透的珠宝，有机串连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绝美的风景。

《永州八记》将柳宗元的思想、情感分散而有机地表现了出来。而最集中、也最强烈地表达了这些内容的作品，还要首推《愚溪诗序》。愚溪原名染溪或冉溪。永州境内有一条主要河流，叫潇水，而染溪为注入潇水的支流。柳宗元在游西山一带景观之中就游览了染溪。在此之前，他在染溪边买地定居，将染溪更名为“愚溪”，写下了《八愚诗》及一篇《愚溪诗序》。《八愚诗》在柳宗元死后即不得传，而《愚溪诗序》由于刻在石上，遂流传至今。序中说明，改染溪为“愚溪”的原因是：自己作为愚溪的主人，处在平庸的时代，不满于现实，而不能如所谓聪明的士大夫一样投机钻营，拍马逢迎，因而被贬蛮荒之地，虽有才华而于世无补，这是“愚”人之所为；溪水本身也幽邃浅狭，不能溉田，无以载舟，对世事没有大的用处，所以也称之为“愚溪”。柳宗元认为，这种“愚”并非智力低下，既不属于“宁武子邦无道则愚”的“愚”，也不属于“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的“愚”，而是《瓶赋》所赞美的损己以利世的愚。作者以自嘲来表达自己如屈原般正道直行而不见容于当权者的愤激之情。序文的最后说：“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透彻，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柳宗元

把愚溪的纯洁秀美和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能联系起来,把对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心情和对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情绪融合在一起。他深深感到,能够赏识这寂寞偏处之溪水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安慰怀才不遇、远谪荒域的柳宗元的,也只有这溪水。这不是李白与敬亭山之间的相看两不厌,而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彼此慰藉,相濡以沫的知遇之情。以“愚人”而遇“愚溪”,同为尘世所弃,这其中蕴含着作者多少愤懑不平的意绪!

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当中,始终处在压抑的心情之下,郁郁寡欢,落落寡合,他有时觉得,这四周的群山仿佛是一座囚笼,而他便是笼中之鸟:“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心之囚吾兮滔滔。”这是悲观几近于绝望之际的哀号。十年当中,他边研读古圣贤文章,边了解现实,虽身处逆境,而不敢忘掉自己的志向,他还在期待着“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笼鹰词》)在苦闷之际,他曾经写信给一些亲友,希望他们帮助自己离开这种处境,以找到一个可以实现其抱负的台阶,但最终也没有结果。他在重重恶势力的包围之下,陷于悲愁孤独之中而不得自拔。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忽然接到朝廷诏书,召他进京。苦闷至极的柳宗元如久旱之土闻响雷,似乎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他百感交集,觉得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此时柳宗元正当四十二岁的盛年。冷静下来之后,他却担忧起来。经验告诉他,自己一向被朝中许多官僚所嫉恨,此去最需要的是静观,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意外打击。当他坐在船上,眼见与相守十年的永州土地和相处十年的永州百姓越来越远时,便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感慨,《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一诗说:“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青,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这“纤鳞”分明指自己,“尺泽”指永州窘迫的处境,“弱羽”和“丹青”,也是指自己与朝廷之间的距离。这里透露出柳宗元对此去前景的忧虑。阔别十年又返皇都,对他来说毕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他还是怀着几分兴奋的心情于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

这次回来,多少有了物是人非的变化。因王叔文事件一起遭斥逐的八司马当中,除了韦执谊和凌準已死,程异在元和四年(809年)迁官外,

被一起召回的是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当时执政大臣当中有人怜惜他们的才干,认为经过十年的改造与悔过,仍是可用之材。但此时的朝中虽不如永贞革新时斗争激烈,而朝臣之间由于政治思想与集团利益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五位司马的回京,使早就嫉恨他们的一批官僚如坐针毡,这些人在宪宗面前百般诋毁、诽谤他们,而宪宗此时因服用道士的丹药而变得乖戾无常,荒诞无度,大臣们的阻挠发生了作用。未及一月,他们又被远派出京,每人虽然官职都由司马升为一州刺史,当上了一地最高行政长官,但就任之所却比以前更为偏远。柳宗元被派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韩泰为漳州(今福建漳州)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后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陈谏为封州(今广东封川县)刺史。明代周思谦在他的《八司马论》中说:八司马当中,惟程异之材为下,而元和之末,犹得以自进于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后知刘(禹锡)柳(宗元)之名愈甚天下,而贬斥之祸愈不得以自伸也。惜哉!欧阳修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用来说明五位司马的再次远逐的原因是再恰当不过了。

柳宗元和其他四人席不暇暖便匆匆启程远行,失望之心情可想而知。柳宗元与昔日的政治伙伴短暂相逢却又不得不歧路分袂。在《衡阳与梦得(刘禹锡)分路赠别》一诗中写道:“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在《重别梦得》一诗中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在《三赠梦得》一诗中说:“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歧别,何年传汝归。”他与刘禹锡感情深厚,远贬同行,一直到衡阳二人才分手,互相以诗赠答,倾诉心曲。

这年六月,柳宗元来到柳州,以一首诗寄给韩泰、韩晔、陈谏和刘禹锡:“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作者在柳州城楼上放眼广袤的荒野,无尽的愁思如茫茫的海天般难以排遣。狂风骤雨之中,芙蓉在水中摇摆不定,薜荔于墙上默默不语。山高障目,江曲添愁。来到这种风异俗殊的蛮荒之地,而音讯又难以相通,这愁思将何时了得!